

## 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

田 澍

洪武、永乐之后，如何应对北部蒙古问题，明朝始终未能找到良策。在对抗屡屡无效后，和解便成为唯一的选择。在这一政策大调整中，张居正辅助高拱，并在穆宗的支持下，在隆庆后期与俺答汗实现了和解，有效缓解了蒙古对北京的直接威胁，但“俺答封贡”并没有真正解决明蒙关系中的固有矛盾。对土蛮等势力，张居正重复着嘉隆时期对俺答汗的态度，拒绝通贡和好，致使其不断侵扰辽东，同时听任俺答部向西移动，破坏着甘肃镇的防御体系，造成了明朝东北、西北两大区域民族格局的重大变化。

**关键词** 张居正 蒙古观 俺答封贡

作者田澍，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70。

元亡明兴之后，明朝与北部蒙古问题便成为14至16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对双方关系的认识，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第二次南北朝，有人认为是敌对关系，有人认为是兄弟关系，有人认为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sup>①</sup>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明蒙关系，有自身的特点，总的来说是在合作中存在冲突，主流是朝贡体制下的合作共生。至张居正时代，明蒙关系已经历二百年，通过对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来探讨这一时期明蒙关系，更能看清明蒙关系的走向与特点，也更能清楚地认识张居正在对待和处理北部蒙古问题上的得失，弥补张居正研究中的薄弱点，并纠正学界在相关认识上的偏差。

### 一、明蒙关系的基本格局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竭尽全力来试图“肃清沙漠”，征服蒙古势力，使其能够臣服于明朝，但与一般王朝更迭时的情形相似，失去中原的元朝残余，一时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是负隅顽抗，利用漠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明朝精锐周旋，使明军远师劳军，难以实现彻底征服的目的。徐达曾问朱元璋：“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朱元璋答道：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四至十六世纪明蒙关系走向研究”（项目批准号：11BZS03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马楚坚：《近十年来中国研究明代蒙古史之回顾》，《明清边政与治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513页。

“元运衰矣，行自渐灭，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sup>①</sup>可以看出，朱元璋具有清醒的头脑，在向漠北用兵的同时，意识到不可能依靠武力来根除元朝残余。<sup>②</sup>朱棣上台后，在招抚的同时，还试图用战争手段来解决蒙古问题，“永清沙漠”。其远大抱负值得肯定，但结果却令人遗憾，未能达到目的。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准备亲征漠北，户部尚书夏原吉与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朝中重臣皆因军费匮乏，一致反对出兵。夏原吉对朱棣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处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朱棣大怒，将夏原吉打入牢中，吕宾自杀。一意孤行的朱棣于次年率兵北征，不久因粮尽还师。后来，“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sup>③</sup>朱棣最终死于师出无功的北征途中。宣宗即位后，老臣范济进言：“洪武初年尝赫然命将，欲清沙漠。既以馈运不继，旋即颁师。遂撤东胜卫于大同，塞山西阳武谷口，选将练兵，扼险以待。内修政教，外严边备，广屯田，兴学校，罪贪吏，徙顽民。不数年间，朵儿只巴献女，伯颜帖本儿、乃儿不花等相继擒获，纳哈出亦降，此专务内治，不勤远略之明效也。”<sup>④</sup>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对蒙古的屡次用兵只能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当双方力量处在相持阶段，战争不是万能的，穷兵黩武是应对蒙古的当下之策。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明朝的进攻已经成为例行公事，可以说有一点成绩，但绝无任何决定性的成就。”<sup>⑤</sup>所以不用兵而使蒙古逐渐归顺明廷是明朝统治者的最高理想。永乐年间，北部蒙古先后向明朝臣服，与明廷建立了朝贡关系，从形式上形成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永乐二年（1404）朱棣对瓦剌使臣说：“夫天下统一，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令还本地射猎畜牧，安生乐业，永享太平之福。”<sup>⑥</sup>但当正常的朝贡贸易难以满足蒙古需求且用战争的方式会得到更大利益时，某一时段强大的蒙古部落便会突破明朝的防御体系而随时南下。

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朝开拓疆域能力不足，其无法与汉、唐两朝相提并论。持此论者，完全无视明朝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蒙古人建立了远超汉、唐的大一统帝国，与汉、唐在北部所处的匈奴、突厥等部族不可同而语，难以比拟。明朝所面对的北部民族问题远不是汉、唐统治者所应对的同类问题，而是唐宋以后北方民族经过五百多年交融发展所形成的全新的民族关系和势力格局，也是唐末以后中国大一统格局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一种表现，显然用汉、唐模式来要求明朝是不可取的。要明朝集中农业文明时代的财力来全面而又彻底地征服蒙古是痴人梦呓。至于说明朝不像汉、唐那样在某一特定时段进取而扩张势力，且一味地内敛，则是一些研究者要求过高。事实上，在明蒙关系中，明朝不可能彻底征服北部蒙古，而蒙古也不可能恢复往日的大元，双方在朝贡体制下处于一种时和时战的状态。正如《明史·兵志》所言：“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sup>⑦</sup>在这一状态中，双方统治者必须找准自己的策略，设法

① 《明史》卷125《徐达传》。

② 参见田澍、陈武强：《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③ 《明史》卷149《夏原吉传》。

④ 《明史》卷164《范济传》。

⑤ [德]艾伯华著，王志超、武婵译：《中国通史》，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⑥ 《明太宗实录》卷31，永乐二年四月辛未。

⑦ 《明史》卷91《兵志》。

与对方和平相处以避免冲突。而蒙古由于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一方面为明朝分而治之提供了条件，便于从整体上削弱其势力；另一方面则使明朝无法形成整体的对蒙策略，找不到一个核心力量来钳制蒙古部众。这样，就使得明朝的蒙古政策始终处于摇摆状态，因蒙古各部势力消长而出现明蒙关系的波动。

就明朝统治者而言，他们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他们受传统“华夷”思想的影响，有时本能地产生一种冲动，时时梦想一举征讨蒙古，使其完全臣服；另一方面，却因军力衰败、财力不支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限，难有建树，不敢轻易言战。在这两难之中，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防御。在双方的拉锯战中，根据双方力量和地理险要，创造性设置“九边”和不间断地修筑长城，便成为明朝的主要任务，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符合实际的正确选择。如弘治年间，蒙古侵扰大同，孝宗听信宦官苗逵所言，准备征讨，阁臣刘健反对出兵，孝宗问兵部尚书刘大夏：“卿在广，知苗逵延绥捣巢功乎？”刘大夏答道：“臣闻之，所俘妇稚十数耳。赖朝廷威德，全师以归。不然，未可知也。”孝宗沉默良久，又问：“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刘大夏又说：“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土马远不逮。且淇国公小违节制，举数十万众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从旁赞议，孝宗很快改变了看法，叹道：“微卿曹，朕几误。”<sup>①</sup>遂罢兵。

就北部蒙古而言，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以及很大程度上对农业经济的依赖，其不可能与明朝隔绝，相反，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自己的明朝，蒙古对明朝有更多的依赖。实际上，这样一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明蒙关系的核心内涵。蒙古渴望从明朝获取自己必需的物资，以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如王崇古所言：“漠北无他产，釜缿之具，仰赖中国。”<sup>②</sup>但因双方政治关系的波动，通过朝贡贸易来满足所需在实践中又是不可能的，故以战争的方式来获取所需便成为北部蒙古的又一必然选择。正如宪宗时的朝臣所言：“明初我方盛强，虏正衰弱，自不敢来，即来亦无所所得。今承平既久，吾士马多耗，人畜颇丰，而虏又适炽，小人则小利，大人则大利，况其出没无常，仓卒难备，至而后应，势每不及。”<sup>③</sup>尽管蒙古也偶尔幻想恢复昔日元朝的一统天下，但其南侵并不是征服战争，而是掠夺战争。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言：俺答“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人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为的供应物资，或者要在40年代和50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提供救济”。<sup>④</sup>

双方对峙的格局就是谁也吃不掉谁，这一状态导致在不同时期，双方所能采取的只能是技术性政策层面的调整。就明朝来说，面对部族林立、不相统一的蒙古，只能分而治之，或通贡，或绝贡，或防御，或适度出击，其实践的结果是或保持相对和平的局面，或引发局部战争。比较而言，和平时期长，战争时期短，那种过于放大明蒙之间战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在朝贡体制下的明蒙关系并不可能完全排除战争，双方一时的冲突是一种正常现象。正如张居正所言：“今中国之人，亲父子兄弟相约也，犹不能保其不负，况夷狄乎……”

① 《明史》卷182《刘大夏传》。

② 《国榷》卷67，隆庆五年二月庚子。

③ 《明宪宗实录》卷256，成化二十年九月丁酉。

④ [美] 牟复礼、[英] 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513页。

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则是以中国之所不能者，而责之夷狄也，有是理哉？”<sup>①</sup>因此，与蒙古能和平相处是上上之策，但能否做到，也不是由明朝一方说了算；即便是由明朝说了算，也不是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有一个内部博弈的过程。要正确认识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政策选项，只能在明蒙关系的这一基本格局中予以观察。

## 二、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政策选项

明代朝臣对待蒙古的态度极为复杂，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和与战的主张并存，难以统一。不同时期的皇帝或听信主战派，或听信主和派，对蒙古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一不确定性，才使明臣在应对北部边防时有多种政策选项。当然，不论选择何种对策，都要经过内部的激烈辩争乃至人事更迭，不可能轻易选择或信手拈来。不论采取何种政策，对明朝而言，也都是有一定必然性的，不存在有利无弊的政策选项。聪明的统治者只能从实际出发，选择利大弊小的应对政策。这是考察明代朝臣蒙古观的基本出发点，当然这也是考察张居正应对蒙古的基本出发点。

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论时政疏》和隆庆二年（1568）的《陈六事疏》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对蒙古的基本认识没有超越其前后同僚，也就是说其蒙古观没有根本性改变。在《论时政疏》中，张居正向嘉靖皇帝进言：

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虑，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励（励）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预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sup>②</sup>

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的看法与当时主流观点一样，其对日益强盛的俺答势力仍然以内修武备为应对的核心策略，并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时，他年仅25岁，刚入翰林院，所论者皆为常理，与主流认识并无二致。在他上此疏后的第二年，发生了俺答汗率领鞑靼兵进攻至北京城下的“庚戌之变”。在张居正上该疏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京畿面临鞑靼兵的巨大威胁，相反，还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大同总兵官周尚文和宣府总兵赵国忠的云中之战沾沾自喜。强调这一点，不是为了贬低张居正，而是在于说明此时的张居正与一般朝臣一样，并没有超人的能力，美化和抬高此时的张居正不符合史实。

在张居正上《论时政疏》之后，俺答汗每每南下，连连侵扰，并一度攻破应州四十余堡，成为有明一代北部蒙古对明朝形成压力最大和最久的时期。面对这一局面，张居正该如何反思并寻找对策呢？首先看看在隆庆二年（1568）进入内阁已有两年的张居正所上《陈六事疏》，在“饬武备”一款中，他说道：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

<sup>①</sup> 《张太岳集》卷28《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降之策》。

<sup>②</sup> 《张太岳集》卷15《论时政疏》。

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著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也。<sup>①</sup>

细读此论，张居正所言之策与20年前的《论时政疏》并无多大区别，既不敢主张主动出击，又不能提出有效的羁縻之策，只能一味地强调内修武备，防守俺答汗，使其不敢南下，而对俺答汗长期提议通贡互市之策置若罔闻，不予回应，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来开创应对蒙古的新局面。而在涉及明蒙关系时，张居正也未能从朝贡体制的格局下来理性地认识眼前的冲突及提出不同于其他人的战略远见。所以，从张居正的这些言论中根本看不出他对蒙古问题有何全新见解，俺答汗20多年的扰边并未能改变张居正对蒙古的固有观念。内修武备、加强防御与不和不战是张居正一以贯之的基本态度，与其他朝臣相比，并无特别之处，没有突破明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的狭隘民族论。正如朱东润所言：张居正的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布置，随时再作出击的计划”。<sup>②</sup>

嘉靖后，朝臣并未找到应付俺答汗的良方，主和被视为软弱和有失尊严之举，加上担心俺答汗无信，基本上不被采纳。正如徐阶所言：“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许则彼厚要我。请遣译者给缓之，我得益为备。援兵集，寇且走。”<sup>③</sup>兵部车驾员外郎杨继盛振振有词，极言“以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认为“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故也。备之一岁，以互市终，彼谓国有人乎？”<sup>④</sup>此等看法听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是不足取的。宋代澶渊之盟的耻辱时时刺激着明代朝臣，对俺答汗采取强硬对策往往能够赢得舆论的好评，但强硬的结果却是时时面临着俺答汗的铁骑蹂躏。在这一氛围里，张居正不敢明言和议之策，加之他没有多大权势且面对朝臣纷争和前途难料，更不愿在此问题上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俺答汗长年的扰边，既是其强大的显示，又是明朝防御失败的写照，再次证明明廷所采取的军事手段是基本无效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除俺答汗威胁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俺答汗的主动攻击和明朝的被动防御中等待俺答汗的老死或病死，或寄希望于鞑靼内乱。张居正也在这一无奈中痛苦地等待着。正如张居正于隆庆四年（1570）所言：“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嵬岷。茹菹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sup>⑤</sup>同年，又说：“年来困于薊议，心焉如捣，苦庙堂不能担当，视听疑惑，

① 《张太岳集》卷36《陈六事疏》。

②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第84页。

③ 《明史》卷213《徐阶传》。

④ 《明史》卷209《杨继盛传》。

⑤ 《张太岳集》卷22《答蕃伯施恒斋》。

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镇，本兵懦弱，甚可虑也。”<sup>①</sup>

张居正等人耐心等来的便是俺答汗内部的分离。俺答汗的爱孙把汉那吉因俺答汗夺其所聘之女在气愤之余投靠明朝。在确定这一信息后，张居正与高拱等阁臣全力支持总督王崇古等人的意见，认为“奇货可居”，迅速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达成与俺答汗的和议。这一突发事件的出现，使明朝找到了一个台阶，变完全被动为部分主动，交还把汉那吉，可以打击俺答汗气焰和减少无度索求，明朝得以保住一点体面。正如高拱所言：“天下之事，以己求人，其机在人；以人求己，其机在己……今彼求贡于我，则其机在我，直许之而已，赏之而已。”<sup>②</sup>张居正的精明、务实充分体现在俺答封贡的这一特殊时刻。在第一时间获悉此事时，张居正就敏锐地感到“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sup>③</sup>要求王崇古迅速如实报告。在完全确认之后，认为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并认为俺答汗“众叛亲离，内难将作”。<sup>④</sup>张居正认识到俺答汗已进入“天亡之时”，要求王崇古坚定信念，不被时论所迷惑，采取一切手段促成互市，结束冲突。他告诉王崇古：“降虏事情，廷臣初意纷纷。然庙堂论定前，已独闻于上，然后拟旨处分。阃外之事，一切付之于公矣。”<sup>⑤</sup>在张居正、高拱书信的不断授意和催促之下，王崇古正式上疏要求与俺答汗和好。对于这一重大决策，按照明代规定，必须经廷议讨论。在经过激烈交锋之后，最后通过封贡之策。采用诸多手段，通过两次廷议，封贡之策最后由多数反对变为多数支持，勉强通过。对于反对封贡的朝臣，张居正予以犀利的谴责，认为他们“以媚嫉之心，持庸众之义，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sup>⑥</sup>只有突破阁权限制，使阁臣与边臣互相沟通信息，并得到穆宗的支持，俺答封贡才能实现。对这一阁臣通过书信沟通来影响明廷重大决策的新现象学界很少有人提及并做专门研究。

在俺答封贡问题上，张居正敢于任事，善抓机遇，对世宗严禁开设马市的政令敢于变通，以一般阁臣的身份与次辅高拱运筹帷幄，最后促成了封贡，实现嘉靖时期主和派的愿望，暂时缓解了宣府、大同一线的军事压力，值得肯定。正如兵部尚书郭乾所言：“九塞诸虏，俺答最雄。自上谷至甘凉，穹庐万里，东服土迷，西制吉丙。先年以谢绝致愤，遂致贻籍诸边三十余年，中原苦不支矣。今俨然听命于藩篱之外，是三十年所祷祀而求者。”<sup>⑦</sup>需要指出的是，俺答封贡只是恢复了明蒙关系中固有的朝贡制度，并不是什么新政。在长期冲突之后，通贡对双方皆有利，而且本来就是俺答汗最初所要达到的目的。换言之，封贡的胜利者真正属于俺答汗！只要明廷放下架子，主动缓和关系，明蒙关系才能改善。张居正等人只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俺答封贡之所以能够实现，根本原因在长年扰边使双方厌战，特别是击碎了主战派的幻想，证明对抗无效；主观原因在于次辅高拱和阁臣张居正与边臣王崇古、方逢时等人的通力配合，赢得了穆宗的支持，压制了朝中的拒和派。正如张居正所言：

① 《张太岳集》卷22《答蓟镇总督谭二华言边事》。

② 《高拱全集·政府书答》卷1《与宣府吴巡抚书四》。

③ 《张太岳集》卷22《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入贡之始》。

④ 《张太岳集》卷22《答鉴川策俺答之始》。

⑤ 《张太岳集》卷22《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

⑥ 《张太岳集》卷22《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⑦ 《国榷》卷67，隆庆五年三月庚午。

“北虏乞贡，顷于文华面奏，奉宸断行之。”<sup>①</sup>《明史·张居正传》论道：高拱“主封俺答，居正赞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明史·高拱传》亦言：“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

翻检各类论著，多数研究者一味谴责嘉靖皇帝对待俺答汗的强硬态度，却不知嘉靖朝对俺答汗的态度是时臣主流的认识，不是皇帝个人的心血来潮，否则，嘉靖皇帝一死，政策立即可以改变，不可能在嘉靖皇帝离世五年后才予以调整。事实上，“从隆庆皇帝统治的1567年到1573年，有关在北方边界应该采用什么政策最好的辩论一直在继续，可是，政治僵局就从来没有打开过”。<sup>②</sup>至于有些研究者把明世宗与鞑靼的绝贡等同于推行“闭关政策”，则是以偏概全。

### 三、俺答封贡后张居正所面临的明蒙关系难题

在充分肯定迟来的俺答封贡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明蒙关系只是趋于缓解，如何在通贡互市的前提下进一步有效控制北部蒙古，仍然是一个难题。在俺答汗封赐之前，明朝对蒙古曾有多次封赐，但效果只是暂时的。蒙古因内部难以达到高度统一，一时崛起的某一势力难以长期有效节制诸部，所以他们的分离势所难免。在俺答汗被封赐顺义王之后，察罕土门汗对其属下说：“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顾弗如。”<sup>③</sup>加之俺答汗步入暮年，控制内部的能力在减弱，处于衰弱之中的鞑靼对封贡的影响也越来越弱。换言之，俺答封贡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整个北方边镇的长期安宁和永久和平。高拱对人们高估俺答封贡之事予以严厉批评，认为“虏人叛服无常，岂可以其一时款顺，遂为安乎！”<sup>④</sup>万历前期，有关鞑靼南下的虚假消息四处传播，搞得张居正神经紧张，生怕出事。万历三年（1575），他对宣大巡抚吴克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边臣故套难改，鲜有为国家忠虑者。而无识言官，动即建白，及与之论边事，一似说梦。近有一科臣，阅辽虚报，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以御虏者。虏在何处，而张皇如是，使人闷闷。此疏若行，岂不远骇听闻，取笑夷虏！”<sup>⑤</sup>尽管此类虚假消息没有变成现实，但民众对鞑靼再次南下的担心是客观存在的。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孤立地谈论万历前十年所谓“张居正改革”，谈到北部边防，又忘记了时间概念，把阁臣中排名第四的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与高拱等人促成的俺答封贡纳入“万历新政”之中。如果严格按照“万历新政”来考察北部边防问题，那只能是重点考察俺答封贡之后张居正任首辅时的明蒙关系。事实上，万历初期的明蒙关系是隆庆后期政策的自然延续，大的格局在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没有根本变化，张居正可以坐享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惯性红利，所以此方面不应成为考察张居正万历初期北部边防的主要内容，而应将俺答封贡

① 《张太岳集》卷23《答三边总督部文川》。

② [美]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等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③ 《明史》卷222《张学颜传》。

④ 《高拱全集·本语》卷6。

⑤ 《张太岳集》卷27《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后新出现的问题作为考察首辅张居正是否有所作为的主要指标。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其中北部边防的持续压力是拖垮明朝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这个原因是长期困扰明朝的一个重大问题，自然不能由张居正一人负责。俺答封贡后，明朝与北部蒙古的战争仍在持续，东北受到土蛮等部的连续攻击，明廷疲于应付，而陕西三边面临蒙古的更大压力，一直持续至明朝灭亡。

潘光旦认为：“抚赏成一种羁縻制度，实例甚多，其弊亦大，俺答封贡以后，尤成一大问题。”<sup>①</sup> 在操作层面，双方互市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否则，不可能持久。相对而言，明朝具有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故有能力承担互市的责任，维持互市的承诺。但俺答汗由于对内控制有限，难以真正有效地执行互市规定，纷争与冲突势不可免。史载：俺答虽封贡，但“插汉部长土蛮与从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从弟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从子黄台吉势力强。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狐狸、长昂佐之。东则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杨吉砮之属，亦时窥塞下。十年之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大将皆战死”。<sup>②</sup> 而朵颜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交通土蛮，时服时叛。万历元年春，二寇谋入犯。驰喜峰口，索赏不得，则肆杀掠，猎傍塞，以诱官军”。<sup>③</sup> 万历五年（1577）夏天，土蛮率兵犯锦州；同年冬天，又与泰宁速把亥分犯辽、沈、开原。<sup>④</sup> 由于戚继光和李成梁等将帅的严防死守，才未酿成大祸。但张居正等人又像嘉靖朝臣一样，对土蛮求贡予以严词拒绝。他认为土蛮“欣艳贡市，其情近真，但为国家长虑，未可许之”。<sup>⑤</sup> 并激愤地说道：“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sup>⑥</sup> 辽东巡抚张学颜亦说：“敌方凭陵，而与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无功与有功同封，犯顺与效顺同赏，既取轻诸部，亦见笑俺答。”<sup>⑦</sup> 当时，“土蛮数求贡，关吏不许，大恨”。<sup>⑧</sup> 万历初年的土蛮，犹如嘉靖时期的俺答汗，“神宗即位，频年入犯”。<sup>⑨</sup> 成为继俺答汗之后扰边的又一股强大势力。但张居正对土蛮的危害认识不清，他在万历二年（1574）说：“今西虏为贡市所羁，必不敢动。独土蛮一枝，力弱寡援，制之为易。”<sup>⑩</sup> 但事实并非如此，面对土蛮等部的连连攻击，除了遣将派兵奋力防守，张居正与嘉靖朝臣一样对辽东边防亦无良策，无法消除战乱。到了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不得不说：“宣府之马岁增，而辽左之患日甚。”<sup>⑪</sup> 但张居正要求辽东总督、总兵、巡抚坚壁清野，被动防守，使土蛮等部抢掠无果，空手而归。他说：“虏若纠大众至，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使之野无所掠，虏气自挫。”<sup>⑫</sup> 读着此类言语，感觉又回到了

① 潘光旦主编：《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明史〉之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75页。

② 《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③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

④ 参见《明史》卷222《张学颜传》。

⑤ 《张太岳集》卷29《答总督张心斋》。

⑥ 《张太岳集》卷29《与张心斋计不许车虏款贡》。

⑦ 《明史》卷222《张学颜传》。

⑧ 《明史》卷238《李成梁传》。

⑨ 《明史》卷327《鞑靼传》。

⑩ 《张太岳集》卷26《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

⑪ 《张太岳集》卷28《答蓟辽总督方金湖》。

⑫ 《张太岳集》卷17《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

对付俺答汗的嘉靖时代。

为了进一步说明俺答封贡之后土蛮等部对明朝频繁的攻击和干扰，兹以《明史·李成梁传》的相关记载为主线，对张居正在阁期间土蛮等部的扰边行为列表如下：

时间	土蛮等部的扰边活动
隆庆五年（1571）	五月，敌犯盘山驿，指挥苏成勋击走之。无何，土蛮大人。
隆庆六年（1572）	十月，土蛮六百骑营旧辽阳北河，去边二百余里，俟众集大举，成梁击走之。
万历元年（1573）	又击走之前屯。已，又破走之铁岭镇西诸堡……朵颜兀鲁思罕以四千骑毁墙人，成梁御却之。
万历三年（1575）	春，土蛮犯长勇堡，击败之。其冬，炒花大会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暖兔、拱兔、堵刺儿等二万余骑，从平虏堡南掠。副将曹簠驰击，遂转掠沈阳。
万历四年（1576）	黑石炭、大委正营大清堡边外，谋锦州、义州。
万历五年（1577）	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
万历六年（1578）	正月，速把亥纠土蛮大人，营劈山。 六月，敌犯镇静堡，复击退之。 十二月，速把亥、炒花、暖兔、拱兔会土蛮黄台吉，大、小委正，卜儿孩，慌忽太等三万余骑壁辽河攻东昌堡，深入至耀州（驿）。
万历七年（1579）	十月，（土蛮）复以四万骑自前屯锦川营深入……俄又与速把亥合壁红土城，声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锦州、义州。
万历八年（1580）	土蛮数侵边不得志，忿甚，益征诸部兵分犯锦州、义州及右屯、大凌河……无何，复以二万余骑从大镇堡入攻锦州……敌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
万历九年（1581）	正月，土蛮复与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暖兔，拱兔，炒户儿聚兵塞下，谋入广宁。 四月，黑石炭、以儿邓、小歹青、卜言兔入辽阳……遂大掠人畜而去。 十月，土蛮复连速把亥等十余万骑攻围广宁，不克，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及十三山驿，攻义州。
万历十年（1582）	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义州……（阿台）数犯孤山、汛河……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去……（清佳砮、杨吉砮）藉土蛮、暖兔、慌忽太兵侵边境……方成梁之出塞也，炒花等以数万骑入蒲河及大宁堡。

从表中不难看出，俺答封贡之后，北部蒙古对辽东的攻势在张居正在阁特别是担任首辅期间愈演愈烈。虽然李成梁等人疲于应对，时有斩获，且受朝廷不断的奖赏，但与嘉靖后期对待俺答汗一样，张居正等人对土蛮等势力不断扰边无法遏止，辽东战乱连绵，使女真趁势而起，明朝对辽东逐渐失控。

如何防止俺答汗势力向西发展，张居正亦无有效对策。万历初年，俺答汗“报怨瓦剌，欲取道贺兰”，遭到了宁夏总兵官张臣的拒绝，“俺答恚，语不逊”。张臣“夜决汉、唐二渠

水,道不通,复陈兵赤,俺答乃从山后去”。<sup>①</sup>而俺答从子永邵卜,“部众强盛”,“先尝授都督同知,再进龙虎将军。自以贡市在宣府,守臣遇己厚,不可逞,乃随俺答西迎活佛,留居青海,与瓦剌他卜囊为西宁患,当诱杀副将李魁。边臣不能报,益有轻中国心”。<sup>②</sup>由于已与俺答汗达成和解,明朝对俺答汗的违约之举或打擦边球的行为亦不敢采取强硬手段。甘肃镇是明廷效法西汉设置河西四郡而建,其像一把尖刀,用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sup>③</sup>俺答封贡后,其部众为了便于前往青海,经常从甘肃镇进入,使甘肃镇官兵不知所措,西北防线被迅速破坏。而北部蒙古大量向青海地区的迁移,彻底改变了明代西北边防的力量对比,使明朝在西北边疆的防守完全置于蒙古的重重包围之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且始终没有找到应对之法。在蒙古部众的连连打击下,明朝军队疲于被动应付,屡屡退缩,直至亡国。史载:“松套宾兔等屡越甘肃侵扰河、湟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于青海,奏赐名仰华,留永邵卜别部把尔户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来者,率取道甘肃,甘肃镇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子真相进据莽刺川,火落赤据捏工川,益并吞番族。”<sup>④</sup>同时,“数犯甘、凉、洮、岷、西宁间。他部落亡虑数十种,出没塞下,顺逆不常”。<sup>⑤</sup>正如明人所论:俺答封贡后,“玩愒寢生,军实耗坠,迎佛掠番,狡谋百出,金钱内尽,藩篱外撤,故识者忧之”。<sup>⑥</sup>俺答部向青海方向的“大蚕食诸番”行为,极大地改变着西部地区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而蒙古势力向青海乃至西藏的积极渗透,给明朝乃至清朝经营西部边疆带来了更大的难题。特别是明朝对此问题无计可施,明末西北边疆战火不断,甘肃镇名存实亡,难以有效地安定地方,使西北边疆与东北边疆皆成为明朝最为严重的“边患”地区,也成为拖垮明朝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明代,蒙古势力的忽兴忽衰,某一势力很难长久地对明朝的北部边防形成持续的压力。无论是张居正之前的瓦剌俘获英宗和吐鲁番等势力对“关西七卫”及甘肃镇的攻掠,还是张居正时代的鞑靼兵临京师和土蛮等势力对辽东的频频侵扰,都是不同时代蒙古不同势力在不同时期崛起后对明朝形成的威胁。这一威胁的形成和消除,一方面取决于蒙古自身内部各势力的消长,另一方面又取决于明廷的应对策略。俺答汗攻势在隆庆年间的有效缓解,是多种有利因素叠加所造成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方面一厢情愿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俺答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蒙古问题的解决,更意味着明朝北部边防威胁的解除。恰恰相反,俺答封贡以后,明朝北部边防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如何在勉强维持封贡所带来的暂时和缓格局中进一步调整策略,应对新危机的出现,张居正等人并没有提出全新的思维,仍然坚持的是内修战备、加强防御和对敌对势力的绝贡与分化等传统套路,未能在战略高度上形成对蒙古的整体应对的重大调整,当然也就不可能指望张居正真正解决北部边防问题。正如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所言:“在天下太平之后,张居正想方设法不要损害和平环境。他处理军事问题的办法多数时候因循守旧。”<sup>⑦</sup>

① 《明史》卷239《张臣传》。

② 《明史》卷239《达云传》。

③ 《明史》卷330《西域传》。

④ 《明史》卷222《郑洛传》。

⑤ 《明史》卷327《鞑靼传》。

⑥ 郑汝璧等纂修:《延绥镇志》卷6《北虏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⑦ [美]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等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第240—241页。

只有把张居正放在整个明蒙关系走向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他的蒙古观及其实践效果,才能真正理解张居正的困境和无奈。张居正个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他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全部变成朝廷的政治实践,况且他在传统惯性中也不可能提出全新的对策。明蒙关系的有效解决主要取决于明朝的经济实力,如能有效解决北部蒙古的生计问题,与蒙古进行全面、切实的通贡互市,并予以优待,双方关系将大大改善。面对单一且不可靠的游牧经济,与明朝通贡和好成为大多数蒙古人的共识。当通贡互市之利远高于战争抢掠时,真正的和平才能维系。万历四年(1576)兵部上疏说:“虏今互市,视昔年所掠,利且倍蓰。”<sup>①</sup>对蒙古而言,这是符合实际的。正如拉铁摩尔所言:俺答汗“表面的忠顺曾使中国封他为顺义王,同时他所修建的青城(今呼和浩特)也被赐名为归化。他对中国最主要的要求是设立贸易,他认为,如果得不到市集捐税的收入,就不能放弃抢掠的利益”。<sup>②</sup>但由于明代发展缓慢的小农经济难以承担对整个北部蒙古的经济扶持,使通贡互市缺乏持久而又健康运行的坚实基础。仅对俺答汗的通贡互市使明廷处于极大的经济压力之中。万历十二年(1584),户部尚书王遴对神宗说:“贡市始自隆庆五年,边臣原拟借和以休兵,修备而不图,财日费,势日弱。始自万历元年,贡市之费,逐年增加,积至于今,恐不啻十倍。繇此而递加,将何底止!”<sup>③</sup>加之明朝吏治不清,难以有效执行互市政策,政策违规走样势不可免,使明朝反而因互市政策而更加被动。正如御史魏允贞所言:“俺答自通市以来,边备懈弛。三军月饷,既剋其半以充市赏,复剋其半以奉要人,士无宿饱,何能御寇。”<sup>④</sup>在这一历史格局和现实政治中,张居正个人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正是由于他没有趁俺答封贡的时机全面调整对蒙古策略并夯实通贡基础,未能带来明廷对北部蒙古战略的全面改变,故其不可能真正解决明蒙关系中固有的矛盾。与明廷相反,在封贡确保自身利益之后,俺答汗将主要精力投入内部整合上,面向青海,拥抱藏传佛教,成为俺答封贡之后蒙藏关系密切的关键节点,开启了蒙古发展的新阶段。包括张居正在内的明臣对此认识不清,从明朝边防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不到此举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当北部蒙古在俺答封贡后向更高目标迈进时,明廷仍停留在原点,仅仅满足于暂时“边患”的减少!后来的研究也仅仅以此为标准来评俺答封贡的意义和张居正的“功绩”!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① 《明神宗实录》卷 52, 万历四年七月甲午。

② [美]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4 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 156, 万历十二年十二月辛酉。

④ 《明史》卷 262《魏允贞传》。

**Change of the Tang Dynasty's Northern Borderland: On the Essence and Nature of Borderland Territory** ..... Li Hongbin (63)

Within the limitation of the first half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 pap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evolving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ries to suggest the essence and nature of borderland territory. With central plain as its core area and borderland as its periphery area, the Tang Dynasty's northern borderland was as a middle zone defined by it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steppe empires in multiple aspects.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periphery influence of th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empires, one in south, one in north, so the borderland was not delimited with an obvious line, but appeared as a constantly changing territory, affected by both sides. So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ang Dynasty's northern borderland was defined by the struggle and game between Tang and nomadic empires. The ambiguity of the borderland was resulted by the people lived on it, and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people, there arose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ideas of borderland. So the essence of the territory was about people. Onl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a state makes a people to be part of it.

**Key words:** First Half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Northern Borderland Territory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Essence and Nature

**On Zhang Juzheng's Viewpoint on Mongol and Its Practical Enforcement**

..... Tian Shu (77)

After the Hongwu (洪武) and Yongle (永乐) periods, the Ming Dynasty could not find an effective policy to deal with Mongols in the north. When all military struggles and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failed to bring about peace, reconciliation became the only choic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big adjustment of policy, Zhang Juzheng (张居正) assisted the counselor Gao Gong (高拱), under the support of emperor Muzong (穆宗), to achieve a peaceful arrangement with Anda Khan (俺答汗), temporarily and partly relieved the pressure of the northern border defence, and effectively removed the direct threat to Beijing by the Mongols. But "Anda Khan's receiving titles and paying tributes" did not really solve all the problems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Mongols. To the Tuman (土蛮) tribes, Zhang Juzheng continued the old policy to refuse their paying tribute, leading to their constant infest in Liaodong (辽东) region, in the meanwhile allowing Anda Khan to move westward, resulted in the damage to the defence system of Gansu (甘肃). So the powers of ethnicities changed in both the northeast and northwest frontiers.

**Key words:** Zhang Juzheng Mongols Anda Khan's Receiving Titles and Paying Tributes

**An Investigation of Shan-gan General Governor Yang Yuchun's Reforming of Official Horse Ranch Administration in Daoguang (道光)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 Zhao Zhen (88)

Official horse ranches were always set in areas full of grass resources in the Qing Dynasty, for example northwest green army's horse ranches were set in steppe area in Gansu, Qinghai and Xinjiang, and horses bred well. In the middle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overstocking,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constrain, and local officials' reforming ideas failing be fulfilled, so the whole official horse ranch administration decl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Yang Yuchun's reforming proposals, like quota, changing price, and refutatory opinion of the ministry of